



The Documents & Research
o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he CPC
during the Yan'an Period

延安时期 党的社会建设文献与研究

研究卷

主编 吴 永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旅游出版社

延安时期党的社会建设文献与研究

The Documents & Research
o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he CPC
during the Yan'an Period

研究卷

主编 吴永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旅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延安时期党的社会建设文献与研究. 研究卷 / 吴永
主编. —西安: 陕西旅游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5418-3587-2

I. ①延… II. ①吴… III. ①中国共产党—社会管理
—研究—1935-1948 IV. ①D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00428 号

延安时期党的社会建设文献与研究·研究卷 吴永 主编

责任编辑:赵 瑶

出版发行:陕西旅游出版社(西安市唐兴路6号 邮编:710075)

电 话:029-85252285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中煤地西安地图制印有限公司

开 本:880 mm × 1230 mm 1/16

印 张:16.75

字 数:350千字

版 次:2018年1月 第1版

印 次:2018年7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18-3587-2

定 价:150.00元

延安时期党的社会建设文献与研究

丛书编委会

丛书顾问：罗平汉 姚文琦

丛书主编：吴 永

编 委：罗平汉 李东朗 吴 永 罗凤琳 韩 玲

丛书总策划：韩 玲

审稿专家：刘玉平 姚文琦

编 辑：黄 良 王建建 胡若涵 赵 瑶 马雪利
宋海平

本册主编：吴 永 罗凤琳

责任编辑：赵 瑶

责任校对：胡若涵

编辑说明

社会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中,这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认识、新概括,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重大意义。社会建设是“五位一体”总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证。中国共产党如何带领全国人民搞好社会建设,是历史和时代赋予中国共产党人的光荣任务。

延安时期党的社会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执政情况下社会建设的成功范例。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制定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法规、政策,不仅保障与巩固了边区政权的稳定,而且作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的示范区、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社会建设中独创了卓有成效的方

法,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有力地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并可为当今的社会建设提供有益借鉴,对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体”格局的实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鉴于此,为了充分挖掘延安时期党的社会建设理论资源和实践经验,为了向社会各方面提供延安时期党的社会建设的翔实可靠的史料和深入研究,陕西旅游出版社组织专家、学者,编写出版了“延安时期党的社会建设文献与研究”丛书。丛书共三册,分别为《延安时期党的社会建设文献与研究·文献卷》(上册)、《延安时期党的社会建设文献与研究·文献卷》(下册)、《延安时期党的社会建设文献与研究·研究卷》。根据文献卷和研究卷的编写要求,进行了以下编辑工作。

文献卷共包含五部分内容,包含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其他抗日民主根据地文件、部分报刊期刊资料。具体的文章编排顺序以地域和时间先后为序分别排列,尽量做到系统完整、重点突出。内容选择方面依据关系社会建设的方方面面尽可能完整收录的原则,主要涉及社会保障、社会教育、婚姻

家庭与妇女权益保障、医疗卫生、民族宗教政策、劳动立法和劳资关系等方面。文献校勘时，注意保持文献的原貌，只对一些错字、别字、漏字进行了必要的处理，对一些简称根据情况加以补全，在尽量保持文献原貌的前提下，将现在的通行用法以不同符号标注其旁。纠正错别字用〔〕；增补漏字用〈〉；衍文或颠倒字在文内直接做了更正；残缺、污损及不能辨明的字句用相应数目的□代之；有疑问的字句在该字句后加(?)以示存疑；对无标点或未分段的文献，直接加上标点并进行了分段；原标题不确切或无标题的，编者根据相关权威资料直接进行了修改或补拟了标题。

研究卷共包含十章内容，分别从延安时期的社会保障建设、社会环境治理、社会教育、医疗卫生建设、劳动立法和劳资关系、婚姻家庭与妇女权益保障、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社会利益协调以及对于新时代党的社会建设的经验与启示等方面进行了研究，遵循历史的考察，理性分析与研究。其中，对一些地名，如葭县、郿县、枸邑、伊克昭盟等，仍采用旧称；一些当时文献中的数据，依现在的数字用法予以更改。

文献卷所收录的文献是研究卷研究的核心,大多文献来源于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图书馆、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和有关纪念馆等单位,以及上述单位编辑出版的有关图书资料。

由于学识所限,加之时间久远,档案史料不够完整,书中难免有纰漏和不足之处,恳望专家和广大读者谅解,且不吝赐教。

丛书编委会

The Documents & Research
o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he CPC
during the Yan'an Period
延安时期党的社会建设文献与研究

研究卷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概述

2	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改造的早期探索与实践
6	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建设的基本概况
19	三、社会建设的相关概念和理论

第二章 延安时期的社会保障建设

22	一、延安时期社会保障政策的演进
28	二、延安时期社会保障建设的实践
49	三、延安时期社会保障的特点及社会历史作用

第三章 延安时期的社会环境治理

- 58 一、剿匪除奸,巩固抗日总后方
- 65 二、禁烟禁毒,净化社会环境
- 74 三、改造二流子,塑造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设者

第四章 延安时期的社会教育

- 82 一、延安时期社会教育的发展与方针政策的演变
- 90 二、延安时期社会教育的组织形式
- 107 三、延安时期社会教育的内容

第五章 延安时期的医疗卫生建设

- 116 一、延安时期根据地医疗卫生建设的发展进程
- 124 二、延安时期医疗卫生建设的主要内容
- 130 三、延安时期医疗卫生建设的基本经验

第六章 延安时期的劳动立法和劳资关系

- 136 一、延安时期的劳动立法与劳动政策
- 146 二、延安时期劳资关系及其协调
- 155 三、鼓励私人经济的发展
- 166 四、延安时期劳动立法和劳资关系协调的经验总结

第七章 延安时期的婚姻家庭与妇女权益保障

- 170 一、延安时期的婚姻家庭立法
- 180 二、延安时期女性的婚姻家庭生活变化
- 188 三、延安时期婚姻家庭变革的作用和意义
- 191 四、延安时期妇女的政治生活

第八章 延安时期党的民族宗教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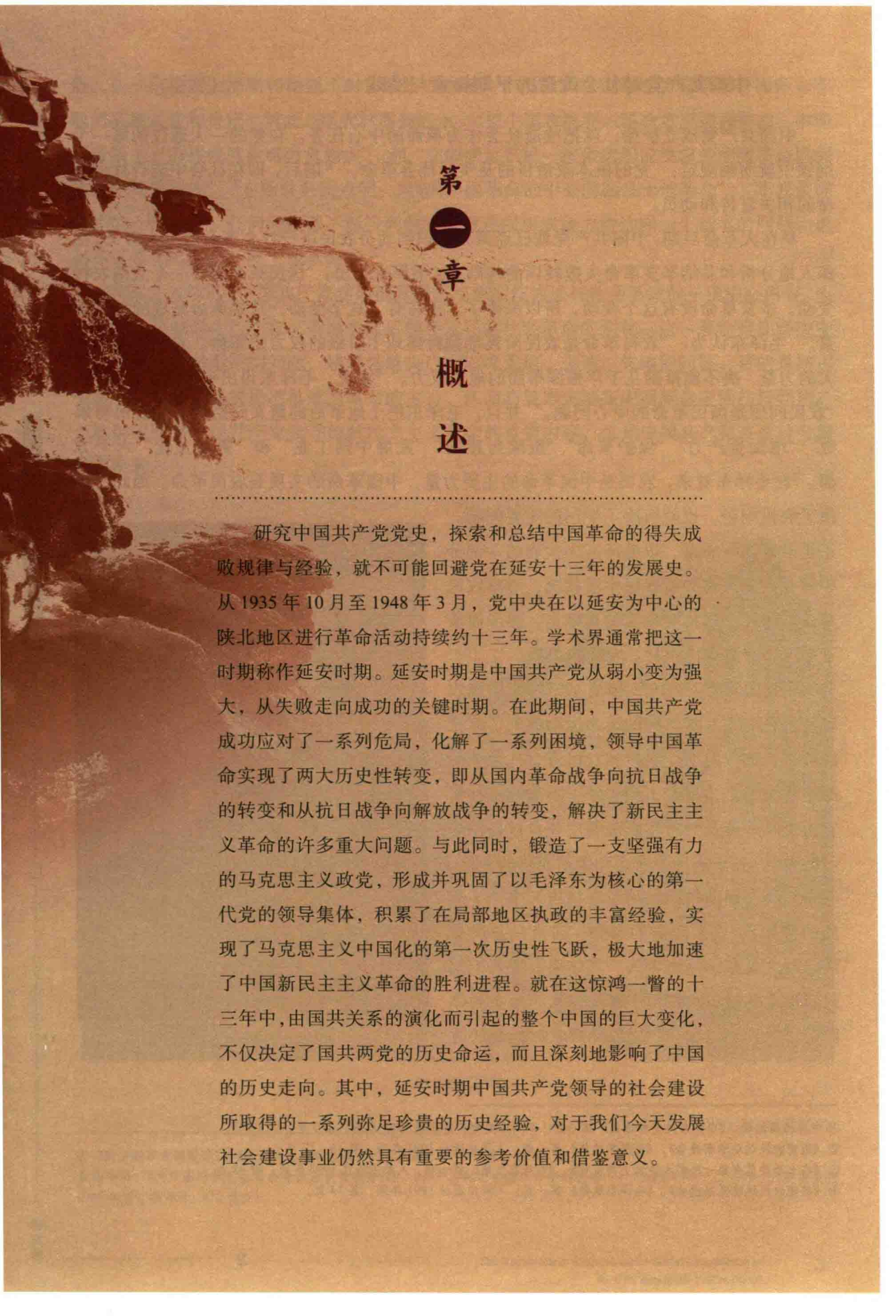
- 196 一、延安时期党面临的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
- 199 二、中国共产党对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探索
- 201 三、党在边区的民族工作及经验
- 206 四、党在边区的宗教工作及经验

第九章 延安时期的社会利益协调

- 216 一、协调各阶级、阶层的政治利益关系
- 224 二、协调各阶级、阶层的经济利益关系
- 237 三、协调社会群体的具体利益关系
- 245 四、协调各阶级、阶层利益关系的经验

第十章 延安时期党的社会建设的经验与启示

- 248 一、改革与理论创新是推动延安时期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 249 二、协调各阶级、各阶层的利益关系是延安时期社会建设的主题
- 252 三、建设清正廉洁的政府是推动延安时期社会发展的根本保证
- 254 四、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让人民群众参与政权并监督政府,是延安
时期社会建设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第一章 概述

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探索和总结中国革命的得失成败规律与经验，就不可能回避党在延安十三年的发展史。从1935年10月至1948年3月，党中央在以延安为中心的陕北地区进行革命活动持续约十三年。学术界通常把这一时期称作延安时期。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从弱小变为强大，从失败走向成功的关键时期。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成功应对了一系列危局，化解了一系列困境，领导中国革命实现了两大历史性转变，即从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转变和从抗日战争向解放战争的转变，解决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与此同时，锻造了一支坚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形成并巩固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的领导集体，积累了在局部地区执政的丰富经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极大地加速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进程。就在这惊鸿一瞥的十三年中，由国共关系的演化而引起的整个中国的巨大变化，不仅决定了国共两党的历史命运，而且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走向。其中，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建设所取得的一系列弥足珍贵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今天发展社会建设事业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改造的早期探索与实践

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把改造社会作为革命的中心任务。在党的一大通过的第一个纲领中就明确规定：“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①随后，即在社会中进行社会革命的相关宣传和动员。

早在大革命后期，中国共产党就已经深刻认识到动员农民进行社会革命的重大意义。在深入地分析和总结辛亥革命失败教训的基础上，毛泽东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毛泽东认为，“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②由此，毛泽东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并且，毛泽东把土地革命的意义归纳为“使农民得解放”“增加生产力”“保护革命”“废除封建制”“发展中国工业”和“提高文化”六个方面。^③在毛泽东看来，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中国革命的实质是农民革命。因此，解决了农民问题，也就解决了中国的主要问题。

正是沿着这一思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人在分析农民生活状况、考察农民革命、研究中国社会现实的基础上，逐步厘清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农村、农民的关系。

在党的领导下，1925年至1927年，中国农村特别是南方各省农村的革命运动得到了广泛的开展。这一时期，农村和农民进行社会革命的主要目标是，打击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贪官污吏，并涉及对封建宗法制度和乡村恶俗恶习的整改。关于这场革命运动带给农村的变化，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作了形象的描述：“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④这种针对农村社会的改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②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7页。

③ 《在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页。

④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页。

造，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和动摇了封建统治的根基。中国的农村革命也引起了共产国际和苏联的高度关注和肯定，对此，斯大林明确表示：“把中国农民卷入革命愈迅速愈彻底，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战线就愈有力愈强大”，而“立即满足农民一些最迫切的要求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最必要的条件”。^①布哈林甚至点明：“当前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土地革命”，“不开展群众性的土地革命，任何问题都不能得到解决。就连组织武装力量这样一个基本的问题，也必不可避免地要求开展土地革命。”^②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立即把开展土地革命作为进行社会革命的一项中心内容。土地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领导发动的社会革命的别称。这一革命旨在解决中国农村土地极端不平均问题，特别是解决广大农民无地、少地、失地的问题，目的是把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动员成为革命的主力，从而凸显出土地在中国革命中的杠杆作用。土地革命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共产党改造社会的重要实践。



八七会议旧址

^① 《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1页。

^② 布哈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情况介绍》，《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68、470页。

在“八七会议”及此后召开的九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中共中央提出：暴动成功后，要立即建立苏维埃政权和进行土地革命，要以土地革命得到的农民支持来保障革命的政权。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更是在井冈山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探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在党的领导下，以农村根据地（苏维埃政权）为依托，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以武装斗争为主要斗争方式，并有机地将三者连接为一个革命的整体。革命中心问题的解决，无疑为党领导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收缴的天平

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和现实依据。而能否正确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则是社会革命成败的关键，因为土地是农民所要取得的最大也是最现实的利益。一般而言，革命的终极目的在于实现革命者对理想的利益或价值的满足。为了激起革命者参与革命的热情，革命领导人就不能不在革命过程中不断地给予其阶段性的部分满足，使其得到感官的或物质上的享受，这样他们才会愿意继续进行革命。如此一来，革命就变成了对其参与者的一种承诺，一旦这种承诺变异或不能满足革命者的最低需求，革命就可能中止。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充分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为此，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根据地先后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土地政策的法令和土地分配的制度，实行了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的土地革命总路线，在实践中解决了农民对拥有土地的渴望。几乎在所有红军经过之地，到处呈现出一派“分田分地真忙”的热烈景象。“拿到土地部颁发的耕田证、耕塘证、耕山证的农民，欣喜若狂，奔走相告，生产热情空前高涨。他们把印有大圆印的土地证看成了‘护身符’。”^①

与此同时，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文化、教育、习俗、宗教等一系列涉及社会改造的运动也蓬勃开展起来。基于巩固红色政权和扫除旧社会的遗毒，以及把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从旧的制度和习俗下解放出来的需要，中央苏区推行的社会改造和社会建设，其一，是革除包办买卖婚姻，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制，保护妇女权益的政策。同时，劝禁缠足、束胸、戴饰等损伤妇女身心健康的旧习俗，肃清三从四德、男尊女卑、守节守贞等旧道德礼教，极大地推动了妇女解放；以禁止和宣传教育相结合的方法，破除民众对鬼、巫、神的迷信。其二，是禁止种植和吸食鸦片；禁止赌博，规定民间赌债一律取消，使民众彻底摆脱毒和赌的危害；通过没收族田、祠产，取缔祠堂、庙宇等活动场所，打击土豪劣绅，

① 邹亮辉主编：《伟大的预演》，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93页。

剥夺族长族权的统治，开展反宗族观念的宣传教育，建立少先队、赤卫队、贫农团、妇女会等组织，用新的组织、文化、价值体系来取代宗族关系；改造那些脱离生产、职业不正当的土匪（含会党）、盗贼、娼妓、兵痞、差人、赌棍、乞丐等游民，使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或成为红军战士；开展对革命军人和家属的抚恤优待，对受灾民众、老弱残疾、鳏寡孤独、移难民实行救济，对工人、职员、各类技术人员与儿童分别实行福利津贴、休假制度、职业培训、义务教育，对雇用劳动者、店员与家庭服务人员实行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与死亡保险；为防止传染病的发生与蔓延，保护和增进民众身心健康，开展群众性的卫生防疫和清洁卫生运动；建立覆盖整个红色区域，包括从适龄儿童到青壮年在内不同年龄层次的教育体系，广泛推出以丰富群众业余文化生活和改善群众精神面貌为目的的墙报、戏剧、报刊和俱乐部等文化项目。^①上述社会建设举措真正使中国社会进入到一个大变革时代。

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革命获得了农民的信任和支持，革命的积极性也被充分地调动了起来。对此，一些国外的报道和评价是：“土地重新分配的结果是农民积极并迅速地倒向共产党，……得到成千上万工人和农民的支持……从整个1933年到1934年，农民都在支持共产主义者。”即使是在红军长征以后，原先由红军占领的地方：“农民更欢迎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美国学者陈志让由此评论说：“正是这种支持使得红色区域在长征之前能够生存下来，而且在其后能够继续开展游击战争。”^②

然而，由于受到“左”倾路线和政策的影响，以及苏维埃政权作为一种从外部（苏联）植入中国社会的“复制品”，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土地革命前期的社会改造尽管激起了农民强烈的革命情绪，但是，在制度建构上基本是失败的。据张国焘介绍，苏维埃政权已经建立三年了，当时鄂豫皖地区的大多数人不知道什么是苏维埃政府，有的猜测说，苏维埃就是苏兆征的别号，甚至有人认为，苏维埃是苏兆征的儿子。^③而湘赣边区的农民则管苏维埃叫“埃政府”，因为当地方言“埃”就是“我”的意思。……他们理解的苏维埃，就是共产党的政府和“埃（我）政府”。^④农民“只知道‘埃政府’是他们的政府，而不知道‘埃政府’的内容……他们以为选出几个人坐在机关里，就叫做〔作〕苏维埃，所以各级机关常时〔时常〕只有执委会议（甚至执委会还少开，只有主席、财务、赤卫或秘书只（？）几个人处理一切）而没有代表会议。这是一般群众政权的意识大〔太〕薄弱，而一般同志对于政权的认识也是莫名其妙的缘故”。^⑤显然，人民对苏维埃政权的困惑亦是土地革命前期党领导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① 周建明等：《回顾历史经验 破解社会建设难题》，《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年第7期。

② [美] 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10页。

③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84—85页。

④ 张鸣：《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6页。

⑤ 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9页。